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Contemporary Economics Series

陈昕 主编

当代经济学译库

创新力 微观经济理论

[美] 威廉·鲍莫尔 著

刘鹰 张哲 等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Contemporary Economics Series

陈昕 主编

当代经济学译库

创新力 微观经济理论

[美] 威廉·鲍莫尔 著

刘鹰 张哲 等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新力微观经济理论/(美)威廉·鲍莫尔著;刘鹰等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9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陈昕主编,当代经济学译库)

ISBN 978-7-5432-2914-3

I. ①创… II. ①威… ②刘… III. ①微观经济学-研究 IV. ①F0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74301 号

责任编辑 唐彬源

装帧设计 王晓阳

创新力微观经济理论

[美]威廉·鲍莫尔 著

刘鹰 张哲 等译

出 版 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

插 页 3

字 数 242,000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2914-3/F·1152

定 价 58.00 元



主编的话

上世纪 80 年代，为了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当代经济学的全貌及其进程，总结与挖掘当代经济学已有的和潜在的成果，展示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我们决定出版“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是大型的、高层次的、综合性的经济学术理论丛书。它包括三个子系列：（1）当代经济学文库；（2）当代经济学译库；（3）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本丛书在学科领域方面，不仅着眼于各传统经济学科的新成果，更注重经济学前沿学科、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的新成就；在选题的采择上，广泛联系海内外学者，努力开掘学术功力深厚、思想新颖独到、作品水平拔尖的著作。“文库”力求达到中国经济学界当前的最高水平；“译库”翻译当代经济学的名人名著；“教学参考书系”主要出版国内外著名高等院校最新的经济通用教材。

20 多年过去了，本丛书先后出版了 200 多种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方面完成了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二是培养了整整一代青年经济学人，如今他们大都成长为中国第一线的经济学

家，活跃在国内外的学术舞台上。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我们将继续引进翻译出版国际上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加强中国经济学家与世界各国经济学家之间的交流；同时，我们更鼓励中国经济学家创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在自主的理论框架内消化和吸收世界上最优秀的理论成果，并把它放到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中进行筛选和检验，进而寻找属于中国的又面向未来世界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理论，使中国经济学真正立足于世界经济学之林。

我们渴望经济学家支持我们的追求；我们和经济学家一起瞻望中国经济学的未来。

厉新

2014年1月1日



我认识的鲍莫尔教授

鲍莫尔教授是我多年的良师益友。在我就读耶鲁大学时就学习了鲍莫尔教授的许多重要经济学思想，例如，鲍莫尔—托宾(Baumol-Tobin)货币最优持有量模型、鲍莫尔成本效应(Cost Disease)理论，以及可竞争市场(Contestable Markets)理论。

鲍莫尔—托宾模型是由鲍莫尔(Baumol, 1952)^①和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 1956)^②分别独立研究的、关于货币交易需求的经济模式。该理论描述一种权衡，即选择持有货币的流动性而放弃利息，还是持有有息资产却失去交易的灵活性。鲍莫尔成本效应描述20世纪60年代的一种现象：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的不断上涨并没有同步，这种现象似乎违背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即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的真实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鲍莫尔的可竞争市场理论认为，在有的市场，数量少、但是可以提供具有长期竞争性均衡服务的企业，可以得到理想的福利结果。因为这样的市场通常有短期出现的潜在竞争者。^③一种“完全的可竞争市场”的存在，是因为可能存在巨大

的沉没成本,这将成为市场进入的障碍。^④

重温鲍莫尔的这些经济学贡献,一方面可以领略一位经济学家大师深厚的学术底蕴,同时也可以看到这些理论对于指导我们研究当今中国经济的重要现实意义。鲍莫尔教授是高产学者——贡献了超过40本专著,发表过500多篇学术论文,他曾经担任1981年度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EA)主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有关创新创业经济学的系列学术思想,既没有在我们的课堂上谈起,也没有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提及。《创新力微观经济理论》这本书,则让我亲眼见证了鲍莫尔先生在88岁高龄依然为奠基创新力经济学而鞠躬尽瘁的敬业,以及蜡炬成灰的执著。

鲍莫尔教授在其序言中谈到本书是他第三次系统地将基于创新创业的经济增长理论引入主流微观经济学领域的尝试:第一次是他1993年的著作《创新力、管理与收益结构》^⑤(武汉大学出版社以“企业家精神”为书名翻译出版了这本书);第二次是2002年的《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自由市场创新机器》(中信出版社翻译出版)^⑥;第三次则是这次我和同事一起翻译的这本《创新力微观经济理论》。鲍莫尔教授这些不懈的努力来自于他抱憾终生的心病——创新企业家(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是创造现代科技和文明的主角,而经济学对创新企业家的行为却缺乏高度抽象的数学分析和严密的解析推导。如果我们将创新企业家的经济学比喻为经济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的话,鲍莫尔教授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陈景润”,《创新力微观经济理论》就是鲍莫尔的“1+2”。鲍莫尔教授对于这个事业的执著影响了一大批年轻学者,我是他的忠实“信徒”之一。

我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关注创新创业经济学的研究。由于缺乏数据,我的研究一直没有太大的进展。也正是由于对这个领域的强烈兴趣,我于2000年结束了在大学的工作,开始了在美国联邦小企业署(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BA)作为高级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也开始了同鲍莫尔教授深度合作的生涯。

2001年初,鲍莫尔教授来到SBA给我们作了一个有关小企业价值的报告,其中谈到小企业就是可以抗争大企业的大卫(请见本书的第2章)。同年,考夫曼基金会(Kauffman Foundation)要我们办公室为“年度安永企业家”(Ernst & Young Entrepreneur of the Year)项目提名。由于早已拜读过他的许

多文章,我提名鲍莫尔教授,并强调虽然鲍莫尔教授不是某个公司的开创者,但他是一位关注创新型企业家重要作用且极具素养的主流经济学家。后来,瑞典的两位经济学家贡纳尔·伊莱亚森(Gunnar Eliasson)和麦格纳斯·汉瑞克森(Magnus Henrekson)在2004年联名撰写文章,称赞鲍莫尔为当代最具创新力的经济学家。^⑦

2003年夏天,鲍莫尔教授通知我参加他个人邀请的纽约大学创新创业经济学研讨会,并让我主持一个专题讨论。^⑧当时参会的除了极少数像我这样不知名的年轻经济学家以外,全是经济学圈内鼎鼎有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包括肯尼斯·阿罗(Kenneth J. Arrow)、罗伯特·莫顿(Robert C. Merton)、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 North)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教授和我的老师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也在场,虽然当时这两位尚未获得诺奖,但是圈内人士都知道他们的获奖不过是时间问题。后来,这两位老师分别在2006年和201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很幸运的是,菲尔普斯教授夫妇和我也在日后的各种研究和讨论的机会中成为好朋友,并为我2015年出版的《阿里巴巴模式:改变游戏规则,在释放草根创新力中成长》一书撰写推荐序。

从2002年开始,鲍莫尔教授和我开始以AEA为舞台,争取每年在AEA有一个创新创业经济学的专题论坛。2005年我们以“威廉·鲍莫尔创新、创业和经济增长特别专题”为名,向AEA提交了理论、实证和国际创新力经济学三个分专题的申请。那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A.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教授任AEA主席,我们三个分专题的12篇文章全部获准参加2006年在波士顿召开的AEA年会。这无疑是对鲍莫尔教授在创新创业经济学研究的毕生努力和无价贡献予以最高形式的肯定和赞誉;也是我为推进该领域的发展所作出的大胆创新尝试。吴敬琏老师在1月8日参加并发表了他与黄少卿合作的文章,题目是《创业与制度: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转型》。^⑨当晚,鲍莫尔教授邀请吴老师和我参加他举办的特别晚宴,我非常高兴地见证我深深敬重的两位老师有机会面对面畅谈各自的研究经历。

同样在2006年波士顿AEA年会上,我于1月7日提交了一篇自己所著的重要论文^⑩,这篇文章是对我2003年文章的进一步完善和提升^⑪。我继

承了古典经济学对劳动的关注,将经济人的劳动划分成两个部分:生产解决温饱的必需品的劳动,以及表达创新意愿、能力和志向的劳动(简称创新劳动)。必需品生产的劳动具有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属性,在经济人的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产生直接的负效用,以及由于消费必需品所间接地获取的正效用。而创新劳动则有不同的属性,这种劳动是经济人具有内在动力的、具有目标指引的、乐于从事的劳动,因此,在经济人效用最大化过程中产生正效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对劳动的划分,经过新古典经济学传统效用函数最大化的数学推导,得出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数学结论:在一系列的假定前提下,当必需品的边际劳动生产价值大于或等于创新的边际劳动生产价值,经济人的效用可以达到最大。我个人认为,这样的研究可以使企业家真正进入主流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体对象。

2006年考夫曼基金会和马克斯·普朗克学会(Max Planck Institute)共同主办的第一届创新力研究和政策峰会在德国慕尼黑郊外的Ringberg城堡举行。^⑩这是继2003年鲍莫尔教授组织的纽约大学私人邀请研讨会以来的又一次关于创新创业经济学高级别研讨会。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鲍莫尔、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菲尔普斯等一些美国主流经济学教授以外,还有以研究创新而著名的斯坦福大学的内森·罗森博格(Nathan Rosenberg)教授,佐尔坦·阿克斯(Zoltan Acs)、戴维·奥德雷琪(David Audretsch)和约翰·霍尔蒂万格(John Haltiwanger)这些我很熟悉的研究创新创业的美国教授,以及一大批我不认识的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经济研究院的专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教授因健康原因未能出席,但是提交了书面发言。我作为评论人参加了会议讨论。

2008年是我们最繁忙的一年。好在有电子邮件和电话的帮助,我与鲍莫尔教授、美国商务部、考夫曼基金会、浙江工商大学时任副校长的张仁寿教授,以及武汉大学经济学院的严清华教授进行了长时间紧锣密鼓的策划。由浙江工商大学承办的题为“释放建设型企业家精神,推动中国商业模式创新”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于6月1—3日在杭州召开;6月3日浙江工商大学鲍莫尔创新研究中心成立。鲍莫尔教授,吴敬琏教授,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戴维·波希吉安(David Bohigian),科技部火炬中心副主任修小平,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等

国内外知名经济专家、学者和杰出企业家代表，以及浙江工商大学校负责人胡祖光、胡建森、张仁寿等出席会议。紧接着，86岁高龄的鲍莫尔夫妇奔赴武汉大学，参加了题为“企业家创新与经济增长：中国的历史与实践”国际研讨会。鲍莫尔教授1993年的 *Entrepreneurship, Management and the Structure of Payoffs* 一书以“企业家精神”为书名由武汉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

此后，我和鲍莫尔教授的合作没有中断。2013年，他和我合作的文章《中古中国：迅猛的发明、缓慢的工业化与创新企业家的缺位》发表在美国哲学学会第157卷的第一册。^⑬我们的合作是愉快的，最使我感动的是，他没有以伟人自居，容忍我在中国创新创业方面相关问题的固执己见。这篇文章经过我们十多次的反复修改，直到我们双方都同意才发稿。他的谦虚为人、严谨治学是我终身的楷模。

鲍莫尔在88岁高龄的时候完成这本著作。虽然有很多篇章是以前发表过的，但是从全书的结构和内容来看，这是鲍莫尔教授最集中、最完美地展示他竭尽一生的追求、积累和信仰的优秀作品。作为一位深情怀抱的经济学家，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如何将最具活力的企业家纳入经济学理论，如何利用国家制度对“游戏规则”这个市场力量的影响，将社会创新力导入建设性的方向，从而让全社会能够充分享受创新对效率提升、福祉增加、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强大溢出效应。作为文章宗匠、绩学之士的鲍莫尔教授，我有幸焚香礼拜、近水楼台。多年来的耳濡目染、春风化雨，我当干师之盍，不可懈怠！

当格致出版社邀请我翻译鲍莫尔教授的《创新力微观经济理论》之时，我有些担忧。其主要原因有二个：第一，我的经济学都是在国外学习的，对大量英文词汇的中文习惯翻译略感生疏。例如，“trickle-down”，我认为翻译成“渗透”是合适的，但是有些人则翻译成“垂滴”或“涓滴”。同时，鲍莫尔教授的文学历史背景深厚，他的引经据典为我们翻译成果通俗易懂的目标增添挑战，我们不得不大量使用“译者注”的方式为读者提供通俗解读。

第二，许多词汇只能意会却难以言喻。最大的困难是翻译“entrepreneurship”。这是一个复词，由名词“entrepreneur”加上后缀“ship”构成。“entrepreneur”原是法语，在包括英语在内的多种语言中，很难找到确切对应的词

汇。但是在中文里翻译成“创业家”或者是“企业家”似乎没有太大的争议。鲍莫尔教授早在1968年的文章中指出：“企业家是经济分析中最有意思也最难以琢磨的因素。长期以来，企业家被视为能够决定企业行为的最高层决策者，因此，他们对自由市场的活力负有重大责任。”^⑭因此，企业家与商人(businessmen)的根本区别在于，“企业家”特指自己创立企业并参与运营的人，“是组织和管理企业、具有相当大的主动性并参与需要承担风险的商务活动的那些人”；^⑮而“商人”则是泛指从事各种商业活动的人，他们可能是企业创始人、企业主、企业股东，也可以是参与企业的日常运营但不是业主的管理人员。^⑯我希望在使用“企业家”这个词汇的时候，一定有如下涵义：“企业家”用创办和运营企业的方式来表达个人创新的意愿、能力和志向。这里，我借用了菲尔普斯教授对带来“大繁荣”的经济“活力”的描述，来定义“企业家”。^⑰

“Entrepreneurship”在中文里往往翻译成“创业”或“企业家精神”，我认为这两种翻译都不能准确表达其真正的涵义。当原文为“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时，我们翻译成“创新企业家精神”，而当“entrepreneurship”单独使用时，我极力建议翻译该单词为“创新力”。“创业”只是经济活动，而“企业家精神”只是精神。这两种翻译都显单薄，不能充分表达英文的准确涵义。在前面提到的2003年的文章，我对“entrepreneur”和“entrepreneurship”进行了细致的定义。对于后者，我将其定义为由三部分力量组成的创新体系：(1)渴望实现生存和发展目标的企业家；(2)保护企业家自由经营、自由竞争权利的社会宪法；(3)有能力充分利用和协调各种组织机构的政府，这些组织机构能够保护每一个企业家，同时有效激励企业家促进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动力。^⑱若用“创新力”来翻译“entrepreneurship”，应该可以囊括来自个人、社会和政府的三个方面力量。谁能说创新可以单打独斗、单靠精神力量，不与一个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联动效应呢？！此外，原文的“productive entrepreneurship”“unproductive entrepreneurship”以及“destructive entrepreneurship”将分别翻译成“建设型创新力”“非建设型创新力”以及“破坏型创新力”。这一组词汇最开始出现在鲍莫尔教授1990年在《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发表的论文中。^⑲

无论如何，翻译鲍莫尔教授的《创新力微观经济理论》是一个艰难的学

习过程,同时也是颇有成就感的经历。在此,我感谢格致出版社对我的信任,邀请我主持翻译鲍莫尔教授的这本重要的专著,感谢钱敏女士在整个翻译项目进展过程中积极的领导作用。我尤其要向格致出版社的唐彬源编辑致以深深的谢意和敬意。鲍莫尔教授著作的内容博大精深,在整个艰难的出版过程中,唐编辑展示出中英两种文字的坚实功底和翻译技巧,以及优秀的敬业精神。

清华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和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为本翻译项目提供了慷慨的资金援助。我深切感谢刘涛雄院长和龙登高主任对本翻译工作的大力支持。我感谢参与翻译本书的所有研究成员,包括:张哲、龚宁、许涛、张晓慧,以及李峰、缪德刚、苗琦、韩晓宇、韩亚品、姜婷凤、钟伟强。没有他们的努力和奉献,本书的翻译工作可能会给我带来更大的压力,要按时完成整个翻译项目会遭遇更大的挑战。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张哲博士在整个翻译工作中所展示的卓越的组织能力、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长期积累的翻译能力和统稿技巧。我负责包括译者序的出版前言、作者序言、内容介绍、第1章、第12章的翻译工作,以及所有章节的校对工作。本书翻译中出现的任何错误,由我个人承担全部责任。另外,我认为原文的部分章节,尤其是部分数学表达和证明的准确性有待商榷。但是为了保持与原著的一致性,没有对这些有待商榷的部分作出太大的改动。

2017年4月5日,我和我丈夫前往纽约市看望鲍莫尔夫妇。相差66岁的鲍莫尔教授和我儿子两人的生日同是2月26日,多年来我们都会在这一天前后去看望他们。往年的重逢总是轻松愉悦,可是这一次我心情很沉重。鲍莫尔教授强打精神,尽力重展旧日的幽默、风趣和尊严。看着他浮肿的脸庞和大面积皮下淤血的左手,听着他那不连贯的言谈,我数次哽咽,频频止泪。在我们临走道别之前,他紧紧拥抱着我,拽着我的手久久不让我离开。难道当时他已经知道那将是我们永久的离别?

一个月以后的5月4日,自熊彼特之后的一代巨匠鲍莫尔教授,在他纽约的家中默默地走了,享年95岁。时值北京时间的5月5日,我收到大量朋友们的慰问以及鲍莫尔家人有关教授去世的电子邮件。6月8日,我应邀去纽约参加鲍莫尔家人举办的教授的悼念仪式。2017年11月19日,我丈夫和我应邀参加普林斯顿大学举办的鲍莫尔学术贡献和思想遗产的纪念大

会。教授的家人和生前同事、好友近百人参加了这个活动。发言者大多谈到教授重要的主流经济学思想和贡献,然而很少涉及他对熊彼特学术理论的忠实传承,以及他对创新力经济学自成体系的发展。明日创新创业经济学的研究,将谁主沉浮?

鲍莫尔教授常常引用英国人广泛使用的、而熊彼特本人也曾用过的一种说法,即用“没有丹麦王子的《哈姆雷特》话剧表演”来描述主流经济学增长理论忽略企业家研究的局面。^②创新创业在西方世界早就成为广泛关注的话题,尤其是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以后,鼓励创新创业成为几乎所有政府经济政策的中心内容。但是,将丹麦王子引进到经济学教科书中,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耐得住寂寞的研究和孜孜不倦的呼吁。我真诚期待《创新力微观经济理论》的出版将有力地激发有数学基础的中国经济学家的强烈兴趣,从而使创新力经济学的研究有进一步颠覆性的突破。

与此同时,本书高度地凝结了鲍莫尔教授几十年对创新力的关注、实践、观察和研究。他对创新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各种作用,以及引导决定创新力属性的机制设置和政策制定有着独到的真知灼见和博古通今的智慧。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后今日的中国,依然跌宕行进在寻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族自信的隧道里。但愿《创新力微观经济理论》成为带领中国经济走出这个漫长隧道的一缕烛光。

刘鹰(Ying Lowrey)

2018年5月于清华园

注 释

- ① Baumol, William J.(1952). “The Transactions Demand for Cash: An Inventory Theoretic Approac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6(4), pp.545—556.
- ② Tobin, James(1956). “The Interest Elasticity of the Transactions Demand for Cash”.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8(3), pp.241—247.
- ③ Baumol, William J. 1982. “Contestable markets: An uprising in the theory of industry structu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2, No.1, pp.1—15 (March).

- ④ Martin Weitzman(1983), “Contestable Market: An Uprising in the Theory of Industry Structure: Comment,” <http://scholar.harvard.edu/weitzman/files/contestablemarkets.pdf>.
- ⑤ Baumol, William(1993), *Entrepreneurship, Management and the Structure of Payoffs*, The MIT Press.
- ⑥ Baumol, William J. (2002), *The Free-Market Innovation Machine: Analyzing the Growth Miracle of Capit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⑦ Gunnar Eliasson and Magnus Henrekson(2004), “William J. Baumol: An Entrepreneurial Economist on the Economics of Entrepreneurship,”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August 2004, Volume 23, Issue 1, pp.1—7.
- ⑧ Eytan Sheshinski, Robert J. Strom & William J. Baumol(2007), *Entrepreneurship, Innovation, and the Growth Mechanism of the Free-Market Econom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ttp://press.princeton.edu/titles/8439.html>.
- ⑨ Jinglian Wu & Shaoqing Huang(2006), “The Entrepreneurship and Institutions: A Perspective to Interpre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 Its Transformation,” <https://www.aeaweb.org/conference/2006/2006papers.php>.
- ⑩ “An Examin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Effort,” <https://www.aeaweb.org/conference/2006/2006papers.php>. 该文也可以在社会科学网络找到: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889068。
- ⑪ “The Entrepreneur and Entrepreneurship: A Neoclassical Approach,” presented at the Allied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s (ASSA) Annual Meeting, January 2003,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Advocacy, SBA Working Paper,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744785.
- ⑫ The Kauffman-Max Planck First Annual Summit on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and Policy, which was held at Schloß Ringberg in Tegern See in the Alps outside Munich in May 2006.
- ⑬ Ying Lowrey and William Baumol, “Rapid Invention, Slow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Absent Innovative Entrepreneur in Medieval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157, No.1, March 2013.
- ⑭ “The entrepreneur is at the same time one of the most intriguing and one of the most elusive characters in the cast that constitutes the subject of economic analysis. He has long been recognized as the apex of the hierarchy that determines the behavior of the firm and thereby bears a heavy responsibility for the vitality of the free enterprise society.” See Baumol(1968), “Entrepreneurship in Economic 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pp.64—71.

- ⑮ Entrepreneur is “a person who organizes and manages any enterprise, especially a business, usually with considerable initiative and risk.” <http://dictionary.reference.com/browse/entrepreneurship>.
- ⑯ The term “businessperson” may refer to founder, owner, or majority shareholder of a business or it can also be used to describe a high-level executive who does the everyday running and management of a business even though the executive is not the owne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usinessperson>.
- ⑰ Edmund Phelps(2013), *Mass Flourishing: How Grassroots Innovation Created Jobs, Challenge and Chan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19—40.
- ⑱ Ibid, “Entrepreneurship, specifically, is defined as an ‘economic system’ that consists of three components; (1) entrepreneurs, who desire to achieve their goals of economic survival and advancement; (2) the social constitution, that the entrepreneur’s right of free enterprise is granted; and (3) the government, that has the ability to adjust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that can work to protect each individual entrepreneur and to stimulate entrepreneurs’ motive to achieve toward fostering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rowth.”
- ⑲ Baumol, W.J. (1990), “Entrepreneurship: Productive, 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893—921.
- ⑳ “It is tempting to argue that the avoidance by recent growth theory of any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capitalist growth miracle is like a performance of Shakespeare’s Hamlet without its central character, the Prince of Denmark.” 见 Baumol(2002), *The Free-Market Innovation Machine: Analyzing the Growth Miracle of Capit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9。



前言

动态微观经济理论中的创新企业家

在意大利，“安东尼奥·费尔特里内利国际奖”（Antonio Feltrinelli International Prize）是为非意大利籍科学家提供的最高奖项。该奖项是由意大利自然科学院（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授予和管理的。意大利自然科学院于1604年成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学术荣誉社团，伽利略是创建者之一。2005年在罗马举行的仪式上，该奖项的经济与社会科学奖被授予该科学院院士之一的威廉·J.鲍莫尔教授。这本书是在鲍莫尔教授的获奖演讲的基础上，大幅度扩充而成。^①

2005年起，我便开始致力于本书的创作。彼时，世界上最古老的学术团体——意大利自然科学院将在罗马授予我安东尼奥·费尔特里内利经济和社会科学奖，我正在准备获奖演讲。谈到罗马的这个荣誉，我将永远感谢我的朋友路易吉·帕西内蒂（Luigi Pasinetti）教授。我不仅要感谢他为我获得该项奖项所付出的努力，同时还希望表达我对他研究工作的敬重。

这本书可以说是我第三次尝试将系统的经济增长

理论引入主流微观经济学领域。目前，主流微观经济学研究中是将经济增长理论排除在外的。正如我在引言中所指出的，如果不从动态角度对微观经济的福利影响进行评估，则对目前的研究而言是很大的缺憾，因为动态视角的福利经济研究是福利经济学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尤其是创新企业家和他们所发挥的作用，作为福利经济学分析中所应该考虑的重要因素却几乎未被讨论，这是福利经济学发展中的重大遗憾。

因此，本书认为，现有的福利经济学研究缺乏对微观经济增长理论的探讨，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重要的理论空白。本书还认为，增长分析需要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方法结合起来，这是不可或缺的。令人高兴的是，目前的宏观分析已经成熟。但是，影响增长的重要决策很多由个人和单个企业做出的，因此，本书将重点讨论发明家个人、创业家个人的选择，以及可能会大量进行研发投入的企业管理。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相关的宝贵经验和实证，但是还未形成规范的理论。因此，本书将会抛砖引玉地展示如何探索和拓展该理论，以期能够弥补该理论发展的巨大空白。

我已经就该书中谈论的很多主题写过不少文章，因此本书没有提出新观点，只是对早前的一些研究成果进行汇总并适当编辑，未对书中涉及的话题进行重新讨论。我相信读者能够谅解我仅在该书中对原有成果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对于这种重新阐释既有观点的做法，我相信读者能够理解。然而这一次，我也许终于能够正确地阐述这些观点了，也终于可以列出一个完整的大纲，系统地论述我的思想。在结束这篇序言之之前，我想遵循常规地表达我对一些组织和个人的感激之情。

我想感谢考夫曼基金会，该基金会不仅为我提供了研究资金，更重要的是，通过它我认识了很多朋友、同事，甚至是合作者。与他们一起工作非常愉快，我期待有机会继续合作。鉴于基金会值得称道的组织目标和愿景，我为我们的合作感到骄傲和愉快。

我要感谢那些给我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的人。他们是我的好友和同事，包括 Magnus Henrekson、Albert Lee、Simon Parker，以及 Mirjam van Praag 教授等。他们启迪我的思想，发现我的错误，并扩展了我的研究内容。在此，我为他们提供难能可贵的帮助表示感谢和欣慰。我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团队，包括高级编辑 Seth Ditchik、制作编辑 Sara Lerner、